

国际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申 烁, 罗朝阳, 李雪松

(中信银行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北京 100026; 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87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大数据与政策评估实验室, 北京 100732)

摘 要: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 进一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考察了营商硬环境和营商软环境对企业 TFP 影响的异同并进行异质性分析, 表明营商环境对中高收入国家企业、大型企业以及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大的边际影响。因此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水平是实现要素优化配置、激发企业与市场活力、促进企业升级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营商环境; 营商硬环境; 营商软环境; 全要素生产率; 全球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F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24)03—0020—07
收稿日期:2024-02-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研究”(22VRC08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申烁(1991—), 河南郑州人, 经济学博士, 中信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罗朝阳(1990—), 通讯作者, 河南开封人, 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雪松(1970—), 江苏宿迁人, 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DOI:10.15991/j.cnki.411028.2024.03.020

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模式转换的关键期,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承压的背景下, 亟须寻找提升我国经济增长动能的金钥匙。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 形成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活跃力量,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关键在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①。在此背景下,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提升企业活力与生产效率成为促进企业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国内不同城市营商环境指数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下简称 TFP)的影响^②, 鲜有文献从国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鉴于此, 本文旨在研究国际营商环境与企业 TFP 之间的关系, 探寻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为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新的思路。本文

创新性地将营商环境分为营商硬环境和营商软环境, 分别考察了不同类型营商环境对企业 TFP 影响的异同, 并进行了丰富的异质性分析和影响机制检验。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营商环境指企业从事创业、投融资、创新发展等一系列活动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总和, 是一个容纳了企业生命周期内所有资源条件和环境状况的综合性生态系统。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将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证、获

① 沈坤荣, 赵倩:《创新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重构》,《南京社会科学》, 2017 年第 5 期。

② 申烁, 李雪松, 党琳:《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1 年第 6 期; 王鹏, 钟敏:《营商环境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统计与决策》, 2022 年第 13 期。

得电力供应、登记财产、获得信贷、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 10 个指标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用于评价国家层面的营商环境^①。多数学者均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指标基础上根据本国实际情形构建对应的营商环境指数。如李志军等构建了包含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以及创新环境 6 个维度的城市层面营商环境指数^②。

TFP 是衡量各投入要素的综合生产率,也是保证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③。在营商环境对 TFP 影响的研究中,Branstetter 等发现优质的营商环境有助于企业摆脱行政环境壁垒、充分发挥市场选择机制,促使企业获得更加便利的融资渠道并降低其融资成本,从而推动企业提升 TFP^④。Şeker 和 Saliola 基于 69 个发展中国家的同质性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与 TFP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⑤。刘军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是企业 TFP 增长的新动力,公开透明的审批程序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企关系从而提升企业 TFP 水平^⑥。

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营商硬环境的完善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效率、降低企业基础运营成本和投入成本、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⑦。Smith 研究发现,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较高的公共服务水平有助于减少企业的创新投资成本、吸引创新型人才,从而促进企业 TFP 水平提升^⑧。市场准入门槛降低、行政审批流程简化、政府行政效率提升、企业税收负担减少、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法治环境规范、跨境贸易增长等软环境指标同样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Khazaei 和 Azizi 研究了开办企业、获得信贷、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和执行合同等营商软环境指标与公司绩效关系,发现此类指标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企业 TFP 水平的提升

投资环境改善有利于释放地区法治环境改善的正面作用,缓解融资约束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及利用,进而推动企业投资效率,从而促进 TFP 提升^⑩。外部市场环境改善有助于产业政策实施,通过提高信贷融资积极治理作用、加强市场化竞争的调节作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进而对企业 TFP 产生正向影响^⑪。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了相对公平便利的成长环境,有助于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与技术扩散。而技术扩散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效率的提升是企业

TFP 增长的源泉^⑫。营商环境越完善、经济开放度越高,国家间技术溢出效应越大,越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促进企业 TFP^⑬。营商环境改善为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提供了沃土,而多元化经营可以分散经营风险,减少由信息不对称引发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合理利用剩余资源,提升经营效率,增加其 TFP^⑭。不仅如此,复合型多元化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协同效应增强企业整体竞争实力,多元化经营战略有助于企业充分利用公司核心能力,提升其经营绩效^⑮,最终有助于企业 TFP 不断提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营商环境优化促进投资效率提升企业 TFP

H3: 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创新能力提升企业 TFP

H4: 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多元化经营提升企业 TFP

-
- ① 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 年第 4 期。
 - ② 李志军等:《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及有关建议》,《江苏社会科学》,2019 年第 2 期。
 - ③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 ④ LEE BRANSTETTER et al., “Do Entry Regulations Deter Entrepreneurship and Job Creation? Evidence from Recent Reforms in Portugal,” The Economic Journal, 577 (2014).
 - ⑤ MURAT ŞEKER and FEDERICA SALIOLA, “A cross-country Analysi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Using Micro-level Data,” Central Bank Review, 1 (2018).
 - ⑥ 刘军,关琳琳:《营商环境优化、政府职能与企业 TFP 增长新动力:“窗口亮化”抑或“亲上加清”》,《软科学》,2020 年第 4 期。
 - ⑦ 申烁,李雪松,党琳:《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经济与管理研究》,2021 年第 6 期。
 - ⑧ KEITH SMITH, “Economic Infrastructures and Innovation Systems,” Systems of Innovation: Technologie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sations, 2 (1997).
 - ⑨ MEHDI KHAXAEI and MOHAMMAD AZIZI, “How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World’s Top Companies are Related to Business Environment?” Applied Economics, 60 (2020).
 - ⑩ 万良勇:《法治环境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3 年第 12 期。
 - ⑪ 何熙琼,尹长萍,毛洪涛:《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银行信贷的中介作用与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南开管理评论》,2016 年第 5 期。
 - ⑫ 涂正革,肖耿:《中国的工业生产力革命: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解及分析》,《经济研究》,2005 年第 3 期。
 - ⑬ DAVID T. COE, ELHANAN HELPMAN and ALEXANDER W. HOFFMAISTER, “International R&D Spillovers and Institu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 (2009).
 - ⑭ SAYAN CHATTERJEE and JAMES D. BLOCHER, “Measurement of Firm Diversification: Is It Rob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 (1992).
 - ⑮ 黄华:《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研究》,《经济问题》,2008 年第 7 期。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处理

为探讨营商环境对企业 TFP 的影响,本文选取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各国(地区)历年营商环境指数与 Osiris 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中 2004—2020 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样本中的已退市公司、金融类保险类公司以及国家(地区)等关键信息缺失的公司样本,剔除后共包含隶属于 121 个国家(地区)的 23396 家上市公司。为研究营商环境分类指数对企业 TFP 的影响,进一步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分为营商硬环境指数和营商软环境指数,并将各类营商环境指数与上市公司数据按照国家(地区)和年份进行匹配,构建了分国家和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借此探究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营商软环境对企业 TFP 的影响。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各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相应的平减处理。由于在使用 Osiris 数据库计算企业 TFP 之前需对各指标的异常值进行处理^①,将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按照首尾各 1%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e)。

(二) 实证模型

为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 TFP 的影响,本文选用如下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nTFP_{ijt} = \alpha + \beta \ln YSHJ_{jt} + \gamma X_{ijt} + \mu_i + v_t + \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 j 、 t 分别代表了企业、国家和年份; $\ln TFP_{ijt}$ 表示 TFP 的对数, $\ln YSHJ_{jt}$ 表示营商环境指数(包含营商硬环境指数和营商软环境指数)的对数; X_{ijt} 代表上市公司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市场价值、营运能力、企业年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无形资产占比; μ_j 代表公司层面固定效应, v_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ϵ_{it} 代表随机误差项,且假设其满足独立同分布。

(三) 关键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 LP 法计算企业 TFP,基于稳健性考量,将基于 OP 法及 ACF 法调整计算的 TFP 用作稳健性检验。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世界银行的“国家营商环境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刘军和刘凌波对于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的界定^②,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中获得电力供应、办理施工许可证和登记财产三项指标划分为营商硬环境指标,将开办企业、跨境贸易、纳税、保护少数投资者、获得信贷、执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七项指标划分为营商软环境指标。用各一级指标在营商环境总指数中所占权重计算营商硬环境和营商软环境两个分指数。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标准差
全要素生产率(LP)	176209	8.725	2.482	0.020	8.636	19.926
全要素生产率(OP)	173119	11.043	2.290	0.707	11.019	22.230
营商环境指数	176211	4.297	0.150	3.570	4.353	4.499
营商硬环境指数	176211	4.279	0.186	3.259	4.380	4.547
营商软环境指数	176211	4.303	0.146	3.616	4.357	4.513
流动比率	176152	1.021	0.442	0.010	0.940	4.557
托宾 Q 值	176211	0.648	0.419	-1.551	0.564	9.385
总资产周转率	175988	0.611	0.319	-0.008	0.587	4.809
资产收益率	175739	0.038	0.150	-5.284	0.049	2.778
长期偿债能力	174558	0.109	0.302	-5.703	0.094	4.340
无形资产占比	173572	0.109	0.162	-0.060	0.034	0.996
企业年龄	176211	3.319	0.798	0.693	3.258	6.205

3. 控制变量

本文将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营运能力、企业年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及无形资产占比等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市场价值用对数托宾 Q 的值衡量,营运能力用对数净资产周转率衡量,企业年龄采用年份减去公司成立年份后取对数衡量,盈利能力用对数

资产收益率衡量,偿债能力用息税前利润与负债之

① MIAOJIE YU, “Processing Trade, Tariff Reductions and Fi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The Economic Journal, 585 (2015).

② 刘军,刘凌波:《营商环境优化如何影响进口贸易方式:软环境优化抑或硬环境改善》,《产业经济研究》,2022 年第 2 期。

比的自然对数以及流动比率的自然对数衡量,无形资产占比用无形资产与总资产比值的自然对数衡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为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营商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均与企业 TFP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营商软环境发展越充分的国家和地区其企业 TFP 水平越高,初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设 H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全要素生产率(LP)	全要素生产率(LP)	全要素生产率(LP)
营商环境指数	1.175*** (0.075)		
营商硬环境指数		0.587*** (0.049)	
营商软环境指数			1.252*** (0.080)
流动比率	-0.134*** (0.016)	-0.133*** (0.016)	-0.134*** (0.016)
托宾 Q	-0.160*** (0.016)	-0.160*** (0.016)	-0.164*** (0.016)
总资产周转率	0.558*** (0.037)	0.555*** (0.037)	0.561*** (0.037)
资产收益率	0.492*** (0.052)	0.489*** (0.052)	0.491*** (0.052)
长期偿债能力	0.022 (0.018)	0.023 (0.018)	0.020 (0.018)
无形资产占比	0.853*** (0.067)	0.852*** (0.067)	0.854*** (0.067)
企业年龄	0.336*** (0.022)	0.359*** (0.022)	0.340*** (0.022)
常数项	4.908*** (0.318)	7.321*** (0.215)	4.573*** (0.339)
公司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3119	173119	173119
R ²	0.097	0.095	0.097

注:括号内皆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参数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下各表不再说明。

表 2 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流动比率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流动比率越高的企业 TFP 水平越低。可能的原因是生

产率低的企业缺乏更好的投资机会,导致企业现金流较为充裕,从而流动比率较高;托宾 Q 值同样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市场价值越高的企业 TFP 水平越低;总资产周转率、资产收益率、无形资产占比和企业年龄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主要是因为高资产周转率企业的管理效率往往更高,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而无形资产占比高的企业往往软实力较强,均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效率。随着企业逐渐积累前期经营、研发经验,企业的管理效率、创新水平往往不断增长,从而企业年龄与 TFP 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3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TFP(LP 法)	TFP(LP 法)	TFP(LP 法)
营商环境指数	1.429*** (0.087)		
营商硬环境指数		1.445*** (0.089)	
营商软环境指数			1.490*** (0.090)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2157	172157	172157
拟合优度	0.097	0.097	0.097
K-P LM 统计量(p 值)	0.000	0.000	0.000
K-P Wald 统计量	16382	9020	17149

(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探讨

为了解决遗漏变量以及反向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各企业所在国家对应年份 40 年前的每千人粗死亡率作为营商环境的工具变量进行进一步研究^①。1960 年代的世界格局较为动荡,这个时期的人口粗死亡率一定程度反映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完善状况。随着时间推移,各国粗死亡率的下降能够反映其 40 年后营商环境的改善程度。粗死亡率高的地区普遍经济较为落后,营商环境相对薄弱,而一个国家历史中营商环境状况又将对其今后营商环境产生影响,从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表 3 报告及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K-P Wald 检验的 F 统计量均大于 10%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K-P LM 统计量的 P 值均小于 0.01,拒绝工具变量识别

① 如本文样本期间为 2004—2020 年,采用的工具变量为各国 1964—1980 年的粗死亡率。

不足的原假设。从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来看,营商环境指数、营商硬环境指数、营商软环境指数的系数同样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研究假设H1依然成立,说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2. 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法

本文接下来采用OP方法和ACF方法计算的TFP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4。从中可以看出,在更换了TFP的度量方法后,各类营商环境指数同样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更换被解释变量度量方法后回归结果

变量	TFP(OP)		TFP(OP-ACF)		TFP(LP-ACF)	
营商环境指数	0.304*** (0.147)		0.649*** (0.046)		1.026*** (0.057)	
营商硬环境指数		0.352*** (0.171)		0.753*** (0.055)		1.187*** (0.068)
营商软环境指数			0.300*** (0.145)		0.642*** (0.046)	1.016*** (0.056)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75251	175251	175251	175252	175252	172157
R ²	0.076	0.076	0.076	0.407	0.386	0.404

3. 更换稳健标准误聚类方法

同一行业内必然包含多家上市公司,相同行业内上市公司的误差项可能会存在相关性,因此本文进一步将稳健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营商环境相关变量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将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本文的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表5 将标准误聚类到行业层面

变量	模型(1) 全要素生产率(LP)	模型(2) 全要素生产率(LP)	模型(3) 全要素生产率(LP)
营商环境指数	1.175*** (0.208)		
营商硬环境指数		0.587*** (0.141)	
营商软环境指数			1.252*** (0.208)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3119	173119	173119
R ²	0.097	0.095	0.097

(三) 影响机制检验

考虑到三步法中介效应模型要求中介变量满足外生性,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做法,仅考察营商环境对中介变量的影响。中介变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①。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分别将企业投资效率、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多元化经营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检验。

企业创新能力采用行业层面的企业平均研发投入衡量。企业多元化经营指数参考赵洁的研究,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衡量,HHI越高代表企业多元化经营程度越低。企业投资效率指数的构建参考Richardson(2006)的做法^②,采用模型(2)测算。

$$Invest_{it} = \alpha + \beta \sum X_{i,t-1} + \sum Year + \sum Industry + \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Invest_{it}$ 表示企业新增投资支出的对数; $X_{i,t-1}$ 为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包括托宾Q值、现金持有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公司年龄; $\sum Year$ 和 $\sum Industry$ 分别表示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 ϵ_{it} 代表模型的随机误差项。然后将回归残差的绝对值作为度量企业投资效率的指标,绝对值越大表明投资效率越低,且残差大于0时为投资过度,残差小于0时为投资不足。考察营商环境对中介变量影响的模型设定如下:

$$\ln INTER_{jt} = b_0 + b_1 \ln YSHJ_{jt} + \gamma_1 X_{ijt} + \mu_i + v_t + \phi_{it} \quad (3)$$

其中, $\ln INTER$ 代表中介变量的对数值,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1)一致。机制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① 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
② SCOTT RICHARDSON,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 (2006).

表 6 机制检验

变量	企业投资效率 (1)	企业创新能力 (2)	企业多元化经营 (3)
	投资效率	创新能力	多元化经营
营商环境	-0.016*** (0.004)	1.292*** (0.083)	-0.042*** (0.002)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44334	123501	152959
拟合优度	0.102	0.543	0.789

表 6 中第(1)列结果显示,营商环境指数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营商环境越好的地区其企业投资效率越高^①。主要因为公正便捷的政务环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务效率有利于打破行政壁垒,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度,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创造力和市场活力,进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开放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能使资源得以自由流动,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更加接近最优投资决策,为企业价值的提升带来助力,促进企业 TFP 水平的提高,说明通过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可以显著提高企业 TFP,接受本文假设 H2。

表 6 中第(2)列结果显示,营商环境指数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优化营商环境增加了市场自主性和活力,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有效地为企业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升了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性,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研发投入从而推动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提升,促进

企业 TFP 的增长^②,说明营商环境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其创新能力,进而促使企业 TFP 提升。衡量企业创新能力接受本文假设 H3。

表 6 中第(3)列结果显示,营商环境指数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主要是因为多元化经营使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剩余资源,发挥核心生产要素功能,扩展研发投入空间,获得更多的协同优势,说明营商环境可以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进而提升企业 TFP,从而接受本文假设 H4。

四、异质性分析

(一)国家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

收入水平差别较大的国家由于其资本积累程度、价值创造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对于相同政策的落实效果也有所不同。据此,本文根据世界银行标准将研究样本按照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区分,回归结果见表 7 第(1)–(2)列。为比较不同分组之间系数的组间差异,这里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Fisher's Permutation test)进行判断。可以看出,中高收入国家样本中营商环境指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中低收入国家样本中仅在 10%水平上显著,且费舍尔组合检验表明分组之间系数具有显著差异,表明中低收入国家样本中营商环境的系数远小于中高收入国家样本。可能的原因是中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更具创新能力,从而外部营商环境改善更能够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依靠创新抢占市场份额,从而有利于改善 TFP。

表 7 异质性检验

变量	国家收入水平		行业属性		企业规模	
	(1)	(2)	(3)	(4)	(5)	(6)
	中高收入	中低收入	高科技企业	非高科技企业	中小型企业	大型企业
营商环境指数	1.386*** (0.079)	0.229* (0.124)	0.822*** (0.145)	1.201*** (0.075)	-0.129 (0.188)	1.203*** (0.072)
常数项	3.965*** (0.321)	7.391*** (0.443)	5.329*** (0.596)	4.380*** (0.305)	8.374*** (0.780)	5.206*** (0.290)
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154652	18467	40436	132683	35192	137927
拟合优度	0.033	0.020	0.035	0.031	0.016	0.036
系数差异 p 值	0.001		0.043		0.000	

(二)行业属性异质性分析

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高科技企业具备更为集中的技术研发密度及更为完备的技术研发设备,对技术研发的依赖程度更高,对研发投入的需求量更

大,更易受到市场环境等的影响,从而影响企业产出

① 投资效率指数越大代表投资效率越低。

② 解维敏,方红星:《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金融研究》,2011 年第 5 期。

效率及运营成果^①。对此,本文基于 GICS 行业分类标准将上市公司样本划分为高科技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两类^②,分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 7 第(3)–(4)列。可以看出,无论是非高新技术企业还是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营商环境与企业 TFP 之间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根据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分组之间系数具有显著差异,且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营商环境的系数更小,表明营商环境改善对非高新技术企业 TFP 的边际影响更大。

(三)企业规模异质性分析

从基准回归结果来看,企业规模差异对生产效率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依据世界通用分类标准,根据员工人数是否在 500 人以下将研究样本分为中小型企业 and 大型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第(5)–(6)列。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家营商环境与大型企业的 TFP 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小型企业的 TFP 之间则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费舍尔组合检验结果同样表明,分组之间系数具有显著差异。规模越大的企业拥有越强大的营运能力及风险承受能力,有更充足的资本购买先进技术设备及组织员工进行专业化培训,更易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实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提升,有助于企业 TFP 的提升。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 2004–2020 年 121 个国家(地区) 23396 家上市公司和营商环境数据研究了营商环境对企业 TFP 的影响及机制并进行了详细的稳健性分析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营商环境、营商硬环境、营商软环境均与企业 TFP 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营商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企业提升 TFP。在处理过内生性问题以及替换 TFP 度量重新估计后本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表明基准结论具有稳健性。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可通过促进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促进企业多元化经营影响企业 TFP。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高收入国家、非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大型企业 TFP 受营商环境的影响更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兼顾营商硬环境和营商软环境的发展,在统筹推进传统与新型基础性硬环境建设的同时,

持续增强软环境发展动力和活力,加深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度,构建高水平营商环境发展体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夯实实体经济发展轨道,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发展新格局。

第二,针对我国营商环境中企业获得信贷及退出机制短板,需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首先,在落实“放管服”改革中深化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退出门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市场主体打造更加便捷、宽松、公平、高效、充满活力的外部市场环境。其次,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率,优化公共服务,在规避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推动利率市场化发展,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第三,针对我国营商环境中企业税收负担短板,需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动能。首先,要进一步优化财税政策,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合理调控直接税间接税比重,有效控制企业税收负担及“五险一金”缴费负担对总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创新活动带来的影响。其次,要施行适度的“减税降费”政策,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实行税收政策鼓励,利用研发创新补贴激发企业研发创新动能,加强基础研究,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四,针对我国营商环境中贸易便利化短板,需不断提升跨境贸易参与度,打造广覆盖、高质量的贸易便利化促进平台。首先,全面深化对外开放,推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提升国家经济开放度与跨境贸易参与度,减少外资进入审批程序,规范市场经营秩序,促进进出口贸易。其次,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减小资源跨国别流动阻碍,充分发挥学习效应潜力,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与自主发展。最后,逐步实现国家间政策调整的频率、力度和方向,减小因政策不协调而导致的贸易壁垒。

① 罗雨泽,罗来军,陈衍泰:《高新技术产业 TFP 由何而定?——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6 年第 2 期。

② 本文将能源设备与服务、化学制品、航空航天与国防、电气设备、航空货运与物流、医疗保健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技术、生物科技、制药、生命科学工具和服务、信息及食宿服务、软件、通讯设备、科技硬件、存储及周边设备、电子设备、仪器和元件、半导体产品与设备、无线电信业务行业的划分为高科技企业,其余划为非高科技企业。

(责任编辑 靳宇峰)

ABSTRACTS

The Parallax Dialectics in Das Capital

Kong Mingan, Xie Yuxing

Dialectics constitutes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 in Marx's Das Capital. If we loo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bject of study, the dialectics of Das Capital are Parallax Dialectics; it is embodied in the parallax of currency and the parallax of surplus value. Parallax is the difference formed by observing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same object. This difference depends on both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herefore, the dialectics of parallax are formed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nd then between the "positive object" and "the real object". Parallax dialectics, by facing this parallax, grasps the reality behind parallax phenomenon, and criticizes the observation still in the stage of "visual deception" on the basis of parallax reality. This paper holds that Marx's investigation of currency and surplus value is the embodiment of parallax dialectics. Therefore, th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of Das Capita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llax will be helpful to deepen the study of Das Capital in China.

Commodity Abstraction, Real Abstraction and Thinking Abstraction——The Triple Abstrac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Commodity And Currency" In Das Capital

Tan Yong

The research on commodity abstraction, real abstraction and thinking abstraction in "commodity and currency" of Das Capital is quite insufficient, and these three abstractions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Das Capital and the critical grasp of capitalism. Commodity abstraction involves commodity form abstraction, value abstraction and exchange abstraction. Real abstraction is the abstraction produced from people's behavior under people's unconsciousness, and its typical representative is commodity abstraction. Thinking abstraction is just opposite to real abstract. It comes from people's th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Its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include mathematical knowledge and natural science concepts. The key to the transition from real abstraction to Thinking abstraction is: first, both of them hav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second, the social synthesis caused by money paves the way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real abstraction to thinking abstraction; third, with the help of "the second nature", the real abstraction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thinking abstraction. The abstract network formed by triple abstraction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is the key to the rule of abstractions in capitalist society. Only by reforming the capitalist society can we be liberated from this abstract network.

The Prior Source of Second Main Stream and Optimal Criteria of Income Distribution

He Zhen

Gini coefficient, the quintile and Inverted-U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s are empirical methods and lack strong theoretical support, being not enough to support to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table olive-type distribution structure and realize a society of common prosperity. We find: (1) the second main strea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law of unequal distribution" in Edgeworth (1877); (2) Edgeworth founded his law by a solid Economics theory. Then at first, we theoretically support the measurement and criterion for income distributions by Edgeworth's production contract curve. Secondly, we propose four optimal measurements and criteria for income distribution unifying both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criteria of optimal distribution curve, optimal Gini coefficient, optimal classification ratio and optimal olive-type structure,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analysis of changes in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Finally, we propose that the current statistical results do not imply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appear to be the shapes of pyramid and dumbbell, that these shapes are caused by not focusing on the harmony between material and immaterial incomes.

International Do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Upgrading

Shen Shuo, Luo Chaoyang, Li Xuesong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can help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enterprises' investment, enhance their innovation ability, promote their diversification, and promote thei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us enhance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respectivel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enterprise TFP influence of both the hard and soft do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furthe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 this study, we find that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greater marginal impact on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in middle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large enterprises or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Therefore, building a market-oriented, law-based and internationalized doing business environments is a key path to achieve optimal factor allocation, stimulate enterprise and market dynamics, and promote enterprise upgrading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